

从照相馆到新闻馆：中国近代职业新闻摄影记者的形成与发展

路鹏程

内容提要 该研究通过梳理中国近代职业新闻摄影记者的出现及其职业化历程发现，新闻摄影记者的职业化是摄影界和新闻界的精英人士职业结合的产物。知名摄影家提供了摄影技巧与经验，精英记者提供了新闻理论和职业道德，共同建构出独特的新闻摄影专业知识体系。新闻摄影专业知识体系使摄影记者在报馆拥有一定组织职业自主性，而报馆这种新闻生产组织和机制又赋予摄影记者广泛的社会职业自主性。摄影记者正是凭借其专业知识体系和职业自主性最终赢得其专业地位的。

关键词 专业主义 新闻摄影 摄影史

摄影史源远流长，成果丰厚，“时至今日，摄影史的书写本身已形成一部历史”^①，但是在中国新闻摄影史研究中有许多重要问题仍然模糊不清，语焉不详，或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甚至讹误杂厕，以讹传讹。比如中国职业新闻摄影记者何时出现，如何形成，怎样发展。

在以往的摄影史研究中，技术史取向将摄影记者的诞生视为特定摄影和印刷技术的产物；艺术史取向将摄影记者的出现浪漫化为某位历史人物的英雄创造；而某些社会史取向则认为“摄影并不具有自足身份。它是随着赋予其上的权利关系而变化的技术”^②。摄影记者仅是摄影技术与新闻机构、社会制度互动与结构化的必然结果^③。并且所有这些论著都或隐或显地秉持一种自然主义的论调，即摄影记者的出现和发展是由古及今，一往无前，自然演化的历史结果。其实，科学技术、关键人物、机构制度均是催生职业摄影记者的必要前提，并非充要条件，而简单自然史和线性进化论的研究理路，更是忽略了摄影记者职业史的曲折与往复、断裂与突

① Jean-Claude Lemagny & Andre Rouillie (eds) , *A History of Photography: Social and Cultural Perspectives* ,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1987 , p. 9.

② John Tagg , *The Burden of Representation: Essays on Photographies and Histories* ,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 1993 , p. 63.

③ 顾铮 《作为新学科的摄影史：历史、现状与反思》，《文艺研究》2010年第8期。

变、矛盾与统一。因此，本文采取职业社会史的视角来重新检视中国近代职业摄影记者的诞生和发展，即探索一段新闻摄影范式的建构史与摄影记者职业共同体的形成史。

一、楚材晋用：照相馆时代的新闻摄影

从晚清开始，特别是步入民国之后，政府机构、工商团体、社会名流遇有重要活动时，追逐欧美风尚，常请照相馆摄影纪念。照相馆趋之若鹜，因为除拍照赚钱之外，一则可以借此自重，播扬名气。如北京山本照相馆受召给黎元洪拍照，便十分自豪地登报广为宣传，“蒙黎大总统之命晋府拍像，敝馆光彩莫过焉”^①；二则，趁机将具有新闻价值的照片大量制作，广为销售^②。北京光明照相楼拍摄“临时参议院开会典礼”和“国宪起草委员会开会典礼”之后，立刻在报纸上大作广告：典礼照片“现已出版，诸君欲购者，特别减价，以表欢迎，特此广告”^③。有时照相馆还主动去拍摄时事新闻，甚至不惜犯险冒难去报道战地新闻、灾难新闻。1926年5月至8月，北洋直奉联军与冯玉祥国民军展开南口大战，北京荣光照相馆派人前去拍摄，并在报纸上广而告之，《南口战地影片》“有数十种之多。现已出版此项影片，于军事上有莫大研究之价值。凡国内有志研究军事者宜速购置是幸”^④。

尽管我国报纸早在清朝末叶即开始刊登新闻摄影报道，但是截至1920年代，北京各大报馆都没有摄影记者，遇有需要拍照的场合，只有求助于照相馆。一些照相馆中人亦积极与报馆合作，如北京同生照相馆老板谭正曦就有求必应，乐此不疲^⑤。而在上海，知名摄影家林泽苍、高维祥当时观察到，“华文各报之新闻照片，均来自于各照相馆，往往不另付值。各报馆于登出时，照片之旁注明某某照相馆摄”。新闻馆获得新闻照片以飨读者，照相馆藉此广而告之以博时誉，两者“固相互利用耳”^⑥。甚至上海的照相馆和新闻馆逐渐形成稳定的合作关系，如“华商照相馆之兆芳、汇芳、及光艺、卡尔生等，所摄之新闻照片多供外国报纸使用。中华、心心及王开等照相馆所摄照片，则多供华文报纸之用”^⑦。所以，直至到1920年代末，“照相馆为新闻照片最大之出产处，盖设备完善，器械与冲晒均甚便利，中国各报馆多

① 《山本照相馆》，《顺天时报》1916年7月29日。

② 全冰雪《中国照相馆史（1859-1956）》，北京：中国摄影出版社，2016年，第244-246页。

③ 《顺天时报》1925年8月30日。

④ 《南口战地影片出版》，《顺天时报》1926年10月21日。

⑤ 赵效沂《报坛沉浮四十五年》，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81年，第5页。

⑥ 林泽苍、高维祥《增广摄影良友》，1928年，转引自王天平、丁彬莹主编《上海摄影史》，上海：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2012年，第100页。

⑦ 林泽苍、高维祥《增广摄影良友》，1928年，转引自王天平、丁彬莹主编《上海摄影史》，上海：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2012年，第100页。

仰给于彼”^①。

除照相馆之外，亦有许多个人、团体和组织积极给报馆提供新闻摄影照片。1920年代，国内各大摄影团体纷纷成立，它们为扩大社会影响，普及摄影艺术，争相给各大报馆投稿各类摄影作品，其中不乏新闻摄影。特别是1925年成立于上海的中国摄影学会专门建立新闻部，面向全国征集新闻摄影作品，以给中外报纸杂志供稿^②；招聘特约新闻记者，专司新闻摄影报道。它还接受内地报纸委托的摄影工作，去拍摄上海及其周边地区发生的重大新闻事件^③。

一些新兴的图片通讯社开始给报馆提供新闻摄影作品。如北京的“中央写真通信社，每月平均送稿八次，每月取费十元，其材料颇合报纸之用”^④。

还有许多摄影爱好者们也热衷给报馆投稿新闻摄影作品，“好摄影而非专门者，时以新闻照片，分送于各报馆，惟所得之酬金甚薄。约自五角至一二元”^⑤。其中有些摄影爱好者还乐于无偿给报馆投稿。如后来成为《大公报》知名记者的张篷舟从1925年开始给《国闻周报》义务供稿，在其画报副刊上发表了许多新闻照片和新闻报道^⑥。

与此同时，一些报馆开始培训文字记者学习摄影技术，兼任新闻摄影工作。上海《时报》老板黄伯惠“规定了馆内所有的外勤记者，一定要能拍照，还要能自己冲印”^⑦。北京《晨报》记者赵效沂曾自学摄影，他主动请求报社给他配置照相机和闪光灯，在日常采访时兼任摄影报道^⑧。天津《大公报》记者汪松年亦兼任摄影工作^⑨。另则，一些大型报馆配有制版部，其技师“有时兼外出照相”^⑩。

尽管摄影稿件来源广泛，但大多不符合新闻报道标准，所以很少被报馆刊录。照相馆是当时报馆最重要的新闻摄影稿源，但报馆对其来稿也采纳不多，“摄十余影，而选用者一二”，因为它们提供的摄影图片大多不具新闻价值，不符报馆的需求。恰如时人所说“照相馆派出之摄影者（老师父或为学生）对于机械式之摄影，当然颇有经验，惟对于新闻学识及‘新闻之价值’（此系新闻摄影最紧要之关键……）则茫然不知，欲得优美之成绩（新闻价值之谓也）难乎其难矣。”^⑪

① 林泽苍《摄影记者指南（三）》，《中国摄影学会画报》1927年4月23日。

② 方汉奇主编《中国新闻事业通史》第2卷，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173页。

③ 林泽苍《摄影记者指南（二）》，《中国摄影学会画报》1927年4月9日。

④ 戈公振《中国报学史》，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13年，第234页。

⑤ 林泽苍、高维祥《增广摄影良友》，1928年，转引自王天平、丁彬萱主编《上海摄影史》，上海：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2012年，第68页。

⑥ 张篷舟《我在大公报的经历》，周雨主编《大公报人忆旧》，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91年，第29页。

⑦ 金雄白《记者生涯五十年》上册，台北：跃升文化事业有限公司，1988年，第116页。

⑧ 赵效沂《报坛沉浮四十五年》，台北：台湾传记文学出版社，1981年，第5页。

⑨ 孔昭恺《旧大公报坐科记》，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91年，第20页。

⑩ 戈公振《中国报学史》，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13年，第230页。

⑪ 林泽苍《摄影记者指南（三）》，《中国摄影学会画报》1927年4月23日。

而摄影爱好者投稿的新闻摄影不仅因缺乏新闻价值，录用率低，还由于拍摄成本不菲，多数人只浅尝一二，便知难而退，更不稳定。民国知名摄影家穆一龙十分熟悉个中的辛苦和尴尬，他当时就发现“间有好玩摄影者偶试小技，投诸各报，而其酬报之菲薄，不及底片车费、往来奔跑、迅速冲洗及专使送达之代价。且或已有此项照片或照片不佳，又不能予以刊登，则前功尽弃，故新闻摄影，除记者外，已渐为人所不敢尝试矣。”^①

图片通讯社是专门给媒体提供各类图片的专业机构，但由于报纸刊登照片数量少，用稿量低，严重制约了图片通讯社的发展空间。如前述中央写真通讯社仅见之于戈公振的论著，而在当时各家报纸中则罕见其提供的稿件或发表的作品^②。

在报馆内部，除少数文字记者对新闻摄影能够胜任愉快，大多数记者感到兼任摄影工作“是一件十分头痛的任务”。这是因当时报馆和记者偏爱使用“方形的3×4、4×5的新闻镜箱”^③，这种照相机体积大、份量沉，十分笨重，以致1935年孙凤鸣冒充记者借新闻摄影之名行刺汪精卫时，可以把手枪藏在镜箱中^④。其次，这种相机操作复杂而繁琐，稍有疏忽便拍摄失败。特别是当时使用的底片，“是玻璃片，每一片装置在一个木匣中，以免曝光，而且每拍一片，就要费去数分钟的时间加以装卸更换，所以，每次出外采访，一个皮匣中装了十张玻璃片，就已显得十分沉重”^⑤。对于一肩双挑，既采写，又摄影的记者来说，确实顾此失彼，难以兼顾。

除新闻摄影来稿质量不佳之外，绝大多数报纸因资本短拙、设备简陋，不具备铜版制版印刷设备，无法在报纸上印制高质量的照片。兼之，日报由于制作周期短、截稿时间紧张等原因，很少能够在日常报道中使用照片。即使刊登新闻照片，这些图片因印刷效果“非常模糊而难饜阅者之望”^⑥。市场反应不佳，报馆便索然寡味。所以，当时只有少数报纸刊载新闻摄影报道，并且这屈指可数的几家报纸所刊登的新闻照片亦少之又少。本研究对《申报》进行随机抽样发现，1917年《申报》在两个构造周内共刊登了5张照片，其中两张是美兴电器公司刊登的机械广告照片，其

① 穆弋龙《新闻摄影杂谈》，《生力》1936年创刊号。

② 在《民国时期期刊全文数据库（1911-1949）》、《爱如生数据库》两大近代期刊数据库中输入中央写真通讯社则无任何纪录，可见其在当时发稿量低、影响有限。

③ 王天平、丁彬萱主编《上海摄影史》，上海：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2012年，第54页；顾执中《战斗中的新闻记者》，北京：新华出版社，1985年，第175页。

④ 王天平、丁彬萱主编《上海摄影史》，上海：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2012年，第54页。

⑤ 金雄白《记者生涯五十年》上册，台北：跃升文化事业有限公司，1988年，第116页。

⑥ 惠民《申报将发行图画周刊》，《商报》1930年4月14日。

余3张都是悬赏通缉的疑犯照片^①。1925年《申报》刊登的照片数量依然很少，在两个构造周共刊登的15张照片中，新闻照片仅五幅，其中现场新闻摄影照片仅3张，并且所有这些照片都是文字报道的配图。

清季民初，报纸刊登的新闻照片主要依靠自由来稿，或者临时约稿，供稿渠道既不稳定，稿件质量亦无保障。报纸只是新闻摄影的传播者，尚未尝试将新闻摄影纳入其制度化的产制体系从而转身为新闻摄影的生产者。不过，它已具备了实现革命性转变的必要物质基础，只是在历史发展的必然性中等待偶然的时代机遇。

二、发凡起例 《时报》与职业新闻摄影记者兴起

1920年6月9日，上海《时报》创办《图画周刊》，是为中国日报有摄影副刊的开端^②。《图画周刊》在1921年黄伯惠接手《时报》后，得到进一步的充实和发展。一则因为黄伯惠追摹美国赫斯特报团的黄色新闻主张，试图以社会新闻、体育新闻与摄影报道，即诉诸传奇故事的感染力和新奇图片的冲击力来招徕读者，打开市场；二则黄氏本人酷爱摄影，“他自己，身上也终年悬挂着一架相机，随时随地，猎取镜头”，甚至“亲自洗晒制版，十分卖力”^③。

黄伯惠对新闻摄影和画报编辑可谓殚精竭虑，全力以赴。同人回忆说，黄氏当时对《时报》“付出了他全部的时间与精力。他几乎每天日夜都在报馆”，但对“编辑部与经理部的日常事务，倒很少过问，他关心的是图片”^④。

在摄影器材设备建设方面，黄伯惠不惜巨资将《时报》新馆三楼整层建成一个巨大的摄影工作室。为印刷出精美的图片，他“特地去欧洲考察，在德国购置了一架‘伏美’牌可套印三色的高速卷筒纸轮转机，这在中国是第一架可以套印几色的轮转机了”^⑤。

为最大程度拓展新闻摄影报道的范围，《图画时报》长期刊载征稿启事：“本刊征求时事照片酬金从优”、“征求国际、国家、地方社会纪事”^⑥。黄伯惠为提高新闻

① 本研究采用随机分层抽样法，从1910年代、1920年代，以及1930年至1937年间等三个时间段内各随机抽取了一年（样本为1917年、1925年、1935年），然后从随机抽中的年份再随机抽取两个构造周，作为最终的抽样样本。社会科学研究者发现“一个构造周足以预测总体均值，两个构造周则更好”，可以让研究者对报纸一年中所有各期的相关报道做出可信的估计（〔美〕丹尼尔·里夫等《内容分析法：媒介信息量化研究技巧》（第2版），稽美云译，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115页）。有研究者发现在武昌起义爆发后一段时间（10月22日-11月19日），《申报》平均每天发表一张照片，“创《申报》刊用新闻照片的历史记录”（唐海江、刘欣《近代中国新闻界对摄影术的认知与运用考》，《现代传播》2018年第5期）。但这是该报在特殊时期的非常举动，并不代表其常态。根据本研究的抽样调查显示，《申报》在1910-20年代，日常新闻摄影发稿量非常低。

② 方汉奇主编《中国新闻事业通史》第2卷，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172页。

③ 顾执中《报人生涯：一个新闻工作者的自述》，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116、179页。

④ 金雄白《记者生涯五十年》上册，台北：跃升文化事业有限公司，1988年，第118页。

⑤ 金雄白《记者生涯五十年》上册，台北：跃升文化事业有限公司，1988年，第115页。

⑥ 《图画时报》1925年2月1日、1928年10月7日、1930年6月12、1932年10月16日。

摄影报道的时效，不仅千方百计，别出心裁，而且不惜工本，一掷千金。1930年全国运动会在杭州召开之际，黄伯惠“在从杭开沪的最后一班的客车中，特设了一间暗房，把当天摄得的照片，在车上冲洗，车抵上海，立即可以制版付印”。时人感叹：“这样不计成本的做法，不能不算是一个大手笔了。”^①

在摄影人才建设方面，黄伯惠“聘用唐僧（景元——镜元，引者勘）帮他注意印刷，并担任室内的摄影”，聘请张有德出任《时报》首位专职摄影记者，亦是上海新闻界第一个职业摄影记者^②，并且黄氏亲自指导摄影记者的实践工作，“该馆摄影记者能每种新闻摄至一二十张，必为黄所嘉奖，如少必摇头说不好”^③。黄伯惠还规定报馆所有的新闻记者，不仅一定要能拍照，而且还能自己冲印。同时，黄伯惠还与他的弟弟——著名摄影家黄仲长，以及唐僧、戈公振共同负责《图画周刊》的编辑工作。

黄伯惠还积极投身于艺术摄影团体的建设发展工作之中。他支持创办了“中华摄影学社”——“20世纪20年代后期我国摄影史上影响最大的艺术团体”^④。该社的主要活动地点就在《时报》馆三楼的摄影室，并在那里先后举办了四届摄影展，开创我国大规模摄影展之先河，吸引数以万计的观众前去观赏，“使摄影风气瞬时遍及全国”^⑤。其中，在华社第二届影展中，黄伯惠展出的摄影作品最多^⑥。《时报》的编辑们也积极参与上海摄影界的各类活动，如戈公振与李尊庸、胡伯翔等组织了中国美术摄影学会^⑦；黄仲长与郎静山创办三友影会，参与国际摄影比赛、沙龙和影展，屡获大奖。

将新闻史与摄影史结合起来看，黄伯惠其实是新闻界和摄影界的跨界精英。时报馆是新闻界热衷摄影的报人与摄影界精英人士交往交流的核心场域。正是凭借对这两个领域的深入了解及有力影响，黄伯惠将双方的精英人士、技艺经验和生产场域充分调动并有机整合起来，不仅创造出享誉一时的《时报》新闻摄影——“上海以时报图照为最佳”^⑧，而且开创了中国新闻摄影职业化的始基，进而逐渐深刻地改

① 金雄白《记者生涯五十年》上册，台北：跃升文化事业有限公司，1988年，第116页。

② 有研究认为唐僧为《时报》“实际上最早的新闻记者”（马运增等编著《中国摄影史（1840-1937）》，北京：中国摄影出版社，1987年，第140页），其实唐僧主要负责印刷和室内摄影，不是专司新闻摄影的摄影记者。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在中国摄影家协会上海分会为编写《上海摄影史》召开的老摄影家座谈会上，有位老摄影家提出：上海第一个摄影记者是张有德（王天平、丁彬萱主编《上海摄影史》，上海：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2012年，第69页）。结合金雄白的回忆，可以断定张有德为上海第一个职业摄影记者（金雄白《记者生涯五十年》上册，台北：跃升文化事业有限公司，1988年，第117页）。

③ 谷声《摄影界闲话》，《大亚画报》1933年5月24日。

④ 王天平、丁彬萱主编《上海摄影史》，上海：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2012年，第22页。

⑤ 王天平、丁彬萱主编《上海摄影史》，上海：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2012年，第23页。

⑥ 蒋齐生《新闻摄影一百四十年》，北京：新华出版社，1989年，第14页。

⑦ 《美术摄影学会新成立》，《申报》1924年7月29日。

⑧ 张友鸾《新闻与图照》，《报学月刊》1929年第4期。

变了上海报业的新闻摄影景观。虽然，黄伯惠在《时报》领导的新闻摄影革新运动具有深远的文化与历史创新意义，但并未立刻带来明显的市场价值与行业反响，使上海报界闻风而起，争相模仿。

1925年6月6日，曾任《时报》编辑的毕倚虹创办了《上海画报》。适值五卅惨案发生，画报对此做了详实报道，使其一出版就得到社会广泛好评。从此，上海掀起一股“画报热”，一时间铜版画报风起云涌^①。1930年5月4日《新闻报》开始编辑出版《图画附刊》，随报附送，其实际负责人是从《时报》跳槽而去的知名记者顾执中。顾执中在《新闻报》时经常邀请制铸铜锌版科的摄影员马庚伯跟他外出拍照，马庚伯遂转为《新闻报》的首位摄影记者^②。《新闻报图画附刊》在创刊号上还广而告之在全国各地招聘特约摄影记者，“专任摄取有关新闻性质之各种图片”^③。戈公振离开《时报》赴欧美考察新闻事业归来后加入《申报》，他于1930年5月18日主持创办了《申报图画周刊》，并随即建立了新闻摄影部，聘请其在中国美术摄影会的同事李尊庸为摄影部首任主任^④。为追求新闻时效和热点，《申报》新闻摄影部广泛征求新闻线索，“本市或附近交通便利之处，遇有特种事件，如因地位机件或其它原因不便摄取者，来函或电话通知本部，非常感盼”^⑤。此外，新闻摄影部还经营图片业务，“专门供给各种新闻、美术及名人照片”^⑥。《时事新报》迫于形势迅速跟进，在1930年10月12日创刊《时事新画》。沪上三大报，特别是作为全国报业龙头的申、新两报对新闻摄影制度的采纳不仅在当时产生广泛影响，而且在新闻与摄影史上也意义深远。这一年，被时人称为“画报的年头”^⑦。

毕倚虹、顾执中、戈公振，这三位上海新闻摄影发展史中重要的先行者都出身于《时报》，恐怕不是偶然。这与黄伯惠的教导启迪，或在《时报》的耳濡目染，可能不无关系，亦可视为黄氏新闻摄影制度性创举的有机组成或遗风流韵。所以，黄伯惠和《时报》对新闻摄影的兴起不仅具发凡起例之功，而且还有催生促发之力，使新闻摄影由孤星独明渐变而为群星璀璨。

① 方汉奇主编《中国新闻事业通史》第2卷，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173页。

② 顾执中《战斗中的新闻记者》，北京：新华出版社，1985年，第141页。

③ 《新闻报图画附刊》1930年5月4日。

④ 《摄影家李尊庸赴浙主持本滋桑秧公司》，《民报》1935年11月26日。多数研究认为王小亭在1931年任摄影部主任或为专职摄影记者（王天平、丁彬萱主编《上海摄影史》，上海：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2012年，第54页；马运增等编著《中国摄影史（1840-1937）》，北京：中国摄影出版社，1987年，第46页），这亦与前述报道冲突，进一步查阅1931年《申报》相关报道发现，王小亭为申报特约摄影记者，即兼职摄影记者，并非其摄影部主任（《本报川边摄影记者王小亭刘硕甫将返沪》，《申报》1931年5月21日；《本报特派摄影记者王小亭刘硕甫昨抵沪》，《申报》1931年6月23日，等等）。还有研究称胡伯洲为《申报》摄影记者，亦有误。胡伯洲其实是在戈公振之后兼职担任《申报图画周刊》主编。

⑤ 郑逸梅《书报旧话》，上海：学林出版社，1983年，第193-195页。

⑥ 《申报新闻摄影社》，《申报》1930年12月7日。

⑦ 黄天鹏《五十年来画报之变迁》，《良友》1930年第49期。

三、集腋成裘：新闻摄影专业知识体系的建构

社会职业史研究发现，一旦一种专业技术工作变成全职职业，对专业知识的系统建构和从业人员的全面培训问题立刻就会被提上日程^①。当时摄影记者来源驳杂，有从照相馆师徒制中磨练出的商业摄影师，有从美术院校毕业的艺术家的，以及无师自通自学成才者，而民国时期又始终未建立起培养摄影记者的专门学校和高等院校^②，所以，新闻摄影专业知识建构和从业人员培训的任务变得急迫而独特——主要是通过各类报刊上讨论和传播新闻摄影知识的方式完成的。

从1920年代中后期开始，新闻记者、图片编辑、摄影记者、知名摄影家开始在各类报刊书籍上撰写新闻摄影论文，将日常拍摄中一点一滴积累起来的新闻摄影技术、经验和反思，加以系统化和理论化，从个体无理论意识的工作实践转向集体有意识的专业知识建构，确立了新闻摄影的基本原则和根本规范：

第一，推崇新闻摄影的新闻价值。“新闻摄影最要之点，在于有新闻之价值”。论者们认为新闻价值构成新闻摄影不同于其他摄影的根本特性，并进而对其做出清晰明确的界定：“新闻照片新闻之价值，则在其能表现其当时新闻之紧要情形和动作，说把这称之为摄取新闻照片之秘诀，亦无不可。”^③他们将新闻价值定为新闻摄影的首要目标，“谓之摄影记者之金科玉律”^④。

第二，倡导新闻摄影“决定性瞬间”的哲学理念。正如有研究者指出，在世界著名纪实摄影家亨利·卡蒂埃-布勒松正式提出“决定性瞬间”这一概念之前，这种理念已经在新闻实践中根深蒂固^⑤。1920年代，中国摄影家们开始在摄影中倡导“决定性瞬间”理念。这种理念将新闻事件中表现最精彩、意涵最深沉的瞬间，霎时凝固，永久流传。摄影家们指出，当机立断捕捉到瞬息万变的“决定性瞬间”决非易事，要求摄影记者不仅具有精湛的摄影技术，而且还要具有高度的新闻素养，其“必须熟悉当时的情形，和这件新闻演变的程序，于是抓住其中重要的地方，迅速地摄取下来。这种机会，是千钧一发似的，务须临机应变，运用纯熟的技巧，立刻摄下”^⑥。在这种理念指导下抓拍的新闻照片，其画面的自然感、现场感，以及带给人的心理冲击感和艺术感染力，同照相馆流行的僵硬的、做作的摆拍照相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这种理念有力地提升了新闻摄影的吸引力与影响力。另则，为更充分落实

① Harold L. Wilensky, "The Professionalization of Everyone?"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vol. 70, no. 2, 1964, pp. 137 - 158.

② 1920年代复旦大学新闻学系、民治新闻学院、北京平民大学新闻学系等新闻院系均开设新闻摄影课程，这只是培训文字记者粗具新闻摄影能力和素养的单门课程，而远非系统培养摄影记者的专业课程体系。

③ 《新闻摄影》，《世界画报》1929年第184期。

④ 林泽苍《新闻摄影之新经验》，《中国摄影学会画报》1927年5月7日。

⑤ (美)玛丽·华纳·玛瑞恩《100个改变摄影的伟大观念》，唐小佳译，北京：中国摄影出版社，2013年，第133页。

⑥ 毛松友《新闻摄影概论》，《黑白影集》1936年第3期。

“决定性瞬间”的理念，摄影家和记者们开始推广使用小型照相机。这种轻巧便捷的小型相机，让摄影记者遁形闹市，“能够出人意料之外地，在人不留意的时候，拍摄他那自然的姿势”^①。

第三，阐扬新闻摄影的职业道德。职业伦理是通往专业主义之路的路标和基石^②。摄影记者宣称，他们坚守新闻道德，以服务社会公共价值为己任，致力于追求真相、传播事实的崇高职业使命和庄严职业承诺——“以微小的生命和大自然搏斗以换取几张小小的照片，并不仅为了个人或声名，他们是感到了人类在地球上创造的开拓性责任的重大”^③。甚至为实现使命，不惜一切代价。“报纸上一分钟、一刹那的享受，也许就是新闻摄影师一生心血生命换来的”^④。

第四，宣传新闻摄影的社会价值。当时社会成见普遍视摄影为奇技淫巧，或雕虫小技，又因为摄影记者出身驳杂而低微，特别是“照相店倌，兼摄新闻照片，故摄影记者的地位，不能引人重视”^⑤。新生的摄影记者、摄影界人士以及新闻记者热烈鼓吹新闻摄影的社会价值“它把活的历史，活的动态，活的纪录，清晰而真实撮录下来，它不但把地球上人类中可注意的人物留下了影像，同时把重大事态发生时的场面，也完全撮成了活影”^⑥。以期提升摄影记者在社会中的文化形象，“此职业，清廉高洁，……在社会占有重要之地位者”^⑦。

摄影记者和摄影家们在建构新闻摄影知识体系时，对摄影技术技巧的讨论着墨不多，因为摄影记者在步入新闻摄影领域之前都已具备良好甚至精湛的摄影技能，所以，他们在建构新闻摄影知识体系时集中在阐释新闻摄影的实践理念价值、职业操守价值、社会贡献价值等三重价值。当“一门技术成为一种价值”时，一份工作就开始演化为一种专业^⑧。在此之前，新闻摄影只是照相馆和新闻馆实现其特定目标的技术和工具；经此之变，摄影记者最终形成一个有其独特思想与方法、技术与经验、标准与常规，以及欲望与激情的职业共同体，新闻摄影成为满足摄影记者群体自身利益诉求和生存需要的根本目的；从此之后，一代又一代的摄影记者“开始把自己的工作看作一种需要专业技术的职业，并认为这一职业应该享有更高的社会地

① 《论小型摄影机》，《飞鹰》1937年第17期。

② 吴飞《新闻专业主义研究》，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28页。

③ 刘凌沧《“新闻摄影”的重要性》，《天津民国日报画刊》1946年9月28日。

④ 君子《我们在银幕下、报纸上的一分钟或一刹那的享受，也许就是新闻摄影师一生心血生命换来的》，《时报本埠增刊》1935年6月29日。

⑤ 毛松友《新闻摄影概论》，《黑白影集》1936年第3期。

⑥ 凌沧《谈“新闻摄影”》，《天津民国日报画刊》1946年1月1日。

⑦ 林泽苍《摄影记者在社会之地位》，《中国摄影学会画报》1927年4月9日。

⑧ Lou Cannon, *Reporting: An Inside View*, Sacramento, CA: California Journal Press, 1977, p. 35. 转引自（美）兰斯·班尼特《新闻：幻象的政治》（第9版），杨晓红、王家全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8年，第239页。

位和更好的薪酬待遇”^①。与此同时，“摄影记者”在普罗大众的眼中，从二十年前“简直没有人听到过的”^②，到十年前“尚未流行社会”^③，终至1930年代一跃成为“在社会占有重要之地位者”^④。

四、一波三折：摄影记者的工作实践与职业发展

自1920年代中后期，职业摄影记者开始纷纷登上历史舞台，时人热烈欢呼中国新闻业迈入“‘竞争摄取照片’之时代”^⑤。但是，摄影记者在工作实践和职业发展中，却并非一帆风顺，而是困难重重，在曲折中前进。

民国时期，“中国教育不普及，甚有摄影为不利之迷信”^⑥。特别是在内陆腹地和社会下层，民众往往因对摄影存在迷信恐惧心理而予以抵制，即使上流社会“名人中畏照像者亦多，非设千方万法，不易着手”^⑦。甚至内地一些地方政府禁止在街头自由拍摄^⑧。特别是前述汪精卫被刺事件发生之后，政府高官对陌生的摄影记者大起戒心，警备森严，害得摄影记者们自哀自叹，其“已被一班官僚目为刽子手了，工作方面，大感棘手”^⑨。所以，当时摄影记者拍照被拒的情况频频发生，颇为苦恼。

照相机操作不便制约着摄影记者充分发挥其创造力。尽管早在1920年代初小型相机就传入我国，但当时在摄影记者中却仍然流行使用中型相机，这种相机体积笨重，操作复杂，不仅文字记者视为畏途，即使对职业摄影记者来说中型相机操作起来亦难得心应手。第一，记者无法灵活机动地迅速抓拍摄影对象。因为“身为记者，本宜东攒西探，若携庞大之镜箱出入于人丛中，颇感不便”。第二，记者只能采取高速快门或在明亮环境中拍摄，否则会因相机抖动而导致画面拍摄模糊。第三，记者在狭小空间内不能自由操纵相机进行构图，束缚了画面的表现力。“反光镜箱镜头之水平线，只能及于胸口，因受观影黑套之限止，难能再把镜头线移高，在普通场合，固毫无问题，而于窗口短墙及轮船上飞机上等处，则觉得此观影黑套大之不便。”^⑩第四，当记者使用闪光灯进行摄影时，镁光粉闪光会爆发出浓厚的烟雾、震耳的噪音、刺鼻的臭味，极易惊扰他人。特别是在人群集会之中，若不提前警示，甚至会导致现场骚乱。有一次“杭州灵隐寺举行‘时轮金刚法会’，沪某报记者在班禅法

① (美) 兰斯·班尼特《新闻：幻象的政治》(第9版)，杨晓红、王家全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8年，第239页。

② 晓广：《怎样做摄影记者》，《新闻杂志》1936年12期。

③ 《摄影记者之常识》，《中国摄影学会画报》1930年5月10日。

④ 林泽苍《摄影记者在社会之地位》，《中国摄影学会画报》1927年4月9日。

⑤ 林泽苍《摄影记者指南(二)》，《中国摄影学会画报》1927年4月9日。

⑥ 林泽苍《摄影记者在社会之地位》，《中国摄影学会画报》1927年4月9日。

⑦ 张友鸾《新闻与图照》，《报学月刊》1929年第4期。

⑧ *The North-China Daily News*, 8th Dec. 1930; *News Photographer Arrested by Police*, *The North-China Daily News*, 4th Oct. 1947.

⑨ 毛松友《新闻摄影概论》，《黑白影集》1936年第3期。

⑩ 穆弋龙《新闻摄影杂谈》，《生力》1936年创刊号，第28-31页。

师左近，骤地轰然一声，终以人心大乱而尝了几小时的铁窗风味”^①。所以在当时，记者“使用镁光粉拍照，最不受人欢迎”^②。

民国时期仅有少数报馆配备有线传真设备，兼之由于国民政府资金短拙、建设滞后，未能建立起覆盖全国主要城市的传真基础网络设施，导致新闻记者争分夺秒抓拍的新闻图片无法像文字报道一样，能够及时迅速地从全国各地四面八方传递到报馆，新闻摄影的时效性大打折扣^③。这也制约了我国各地新闻媒体之间，以及与国外新闻媒体之间及时交换新闻图片的业务^④。另则，摄影设备耗材集中在通都大邑，在广大内陆地区不易采购，限制了都市摄影记者的采访半径和工作范围。记者外出旅行摄影备极辛苦，极为不易。如1932年，《良友》摄影团一行四人，从上海出发赴全国旅行摄影时，携带大小摄影机六种、胶片五种、多具特制旅行冲洗设备，以及其他各种旅行用品，共计十四箱之多。摄影团历时九月跋涉万里拍摄的一万多张照片都是在颠簸的旅途中自行冲洗，然后寄回上海刊印^⑤。尽管上述原因，对大都市的摄影记者来说，不是一种结构性技术障碍，但它却结构性地制约了摄影记者和新闻摄影在地方性报刊的出现和发展。

摄影记者和画刊画报的兴起对传统的报刊编辑提出了新的工作诉求，或者说创造了一种新的岗位——“图画编辑”^⑥。以往，报刊编辑只是将新闻照片简单罗列在版面上就完事大吉。现在，图片编辑则需融汇艺术学和新闻学原则，“对于图片之生动，拼版之参善有致”能够匠心独运地进行创造性的编辑^⑦。但是，除少数胜任愉快者外，当时各大报刊普遍缺乏此类人才。如《良友》第二任主编周瘦鹃就是“对图片的组织、选用和编排都是外行”，以致被迫去职^⑧。这限制了新闻摄影充分发挥其表达魅力和传播效力。

日报对新闻摄影刊用率低，摄影记者不受重视。各大报纸“对于刊载‘新闻照片’视为附带性质，而非专门经营”，图片刊载率低，“每日发刊的日报，有图片者，并不见得怎样地普遍”^⑨。本研究对1935年《申报》的随机抽样调查显示，除去其《图画周刊》的专刊而外，《申报》共刊登各类照片共438张，比1925年高近

① 晓广：《怎样做摄影记者》，《新闻杂志》1936年12期。

② 蒋齐生：《新闻摄影一百四十年》，北京：新华出版社，1989年，第70页。

③ 刘凌沧：《画报与新闻摄影》，《北晨画报》1935年第1期。关于传真在中国新闻界的应用相关研究可参见王明亮：《传真技术传入中国考：兼述其在新闻事业中的应用》，《国际新闻界》2013年第9期。

④ 蒋齐生：《新闻摄影一百四十年》，北京：新华出版社，1989年，第75页。

⑤ 马国亮：《良友忆旧：一家画报与一个时代》，北京：三联书店，2002年，第81页。

⑥ (美)玛丽·华纳·玛瑞恩：《100个改变摄影的伟大观念》，唐小佳译，北京：中国摄影出版社，2013年，第129页。《申报》组织系统表中即有图画编辑一职，《新闻报》组织系统表中在编辑部文艺科下设有图画股，见郭步陶编著：《本国新闻事业》，上海：申报馆，1936年，第108-111页。

⑦ 黄天鹏：《五十年来画报之变迁》，《良友》1930年第49期。

⑧ 马国亮：《良友忆旧：一家画报与一个时代》，北京：三联书店，2002年，第17页。

⑨ 刘凌沧：《画报与新闻摄影》，《北晨画报》1935年第1期。

三十倍。可以推论说，《申报》1930年代在一天刊登的照片数量几乎等于其1920年代一个月刊登的照片数量。但是在抽取的438个样本中，共有61幅新闻摄影作品，而其中47幅是全国运动会特刊的体育新闻摄影，其他新闻摄影照片仅14幅，其余的几乎都是广告，并且绝大多数是电影广告。而进一步考察其周一、周四随报出版的《图画周刊》样本，共刊登照片61张。平均而言，《申报》每周刊登新闻摄影报道约16张。相对于其当时每日36个版面来说，《申报》新闻图片刊载率可谓非常之低。更让摄影记者在报馆中感到尴尬的是，他们职位低，薪水少，工作岗位飘摇不定，以致时人抱怨“摄影记者的报酬太菲薄，不能成为职业”^①。

摄影记者的职业垄断权始终受到照相馆的挑战和威胁，照相馆仍然是给报馆和社会提供新闻图片的重要来源。个别实力雄厚的照相馆，有时不惜人力财力追求新闻时效，令各报摄影记者瞠目结舌，相形见绌。如1933年全国运动会期间，作为指定摄影单位的王开照相馆，“租飞机一架，于上午八时五十分飞至南京，下午三时三刻，将大会照片，由飞机带沪，于当晚五时半到达，即赶冲晒，分送各报”^②。1939年7月，天津水灾期间，当地知名照相馆“中国摄影公司”乘木船去灾区纪录灾情。中国摄影公司老板李耀庭将拍摄到的一百余幅照片，制成一千余册画册和一万多张明信片，广为销售，获利不菲^③。

虽然导致新闻摄影发展受限的原因涉及文化、技术、外部竞争等多个层面，但是时人认为“最大的原因，仍然是提倡不力的缘故罢了。”^④1935年民国著名摄影记者毛松友悲哀地发现，作为中国新闻舆论和摄影发展中心的上海，“近年来各报的摄影部都裁撤了，摄影通讯社也只有官办的国际新闻摄影社一家，这是很可悲的”^⑤。亚东新闻摄影社因“新闻摄影，取材有限”，改组为新闻通讯社^⑥。上海第一个职业摄影记者张有德也已告别《时报》去经营有德照相馆^⑦。与此可以相互印证的还有，1935年申时电讯社所开展的全国新闻工作者调查显示，在1634名新闻从业人员中，标明为摄影记者或所任职务为摄影者，仅三人而已^⑧。当然这个调查未能穷尽所有的记者，难免挂一漏万，但是登记在案的摄影记者凤毛麟角，说明当时摄影记者人数极为有限。

① 刘凌沧《画报与新闻摄影》，《北晨画报》1935年第1期。

② 《王开照相馆 热心服务》，《时报》1933年10月12日。

③ 李博文《天津照相业的先驱：李耀庭与中国照相馆》，中国民主建国会天津市委员会、天津市工商业联合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天津工商史料丛刊》第5辑，1986年，第105-115页。

④ 刘凌沧《画报与新闻摄影》，《北晨画报》1935年第1期。

⑤ 毛松友《新闻摄影概论》，《黑白影集》1936年第3期。

⑥ 《亚东新闻摄影社改组通讯社》，《民报》1934年5月21日。

⑦ 驾若《张有德筹办摄影室》，《正气报》1932年12月4日。

⑧ 《全国新闻从业员调查表》，转引自李开军《中国记者历史专题研究》，济南：山东文艺出版社，2009年，第266-354页。

全面抗战时期，新闻摄影为抗战宣传做出巨大贡献，摄影记者的地位和影响在血火洗礼中得到空前提高。摄影记者、摄影家们纷纷将相机转向国族危亡，拍摄了大量蜚声一时、影响深远的新闻摄影、纪实摄影作品。这些作品不仅刊登在报刊杂志上，而且还广泛用于摄影展览、公共演讲、海报招贴，这将新闻摄影的社会地位和时代影响推至顶峰。同时，摄影记者不畏艰险，为拍摄照片在炮火纷飞的战场出生入死，或在危机四伏的敌后机智周旋的英勇精神和传奇经历，经过报纸的广泛报道宣传后，使不少新闻摄影记者成为社会仰慕的名人和民众崇敬的英雄。

正当几位最有声望的战地摄影记者叱咤风云之时，整个摄影记者群体却陷入万马齐喑的困顿处境。随着抗战的延续，因为铜版纸和白报纸极度匮乏，报刊所使用的土纸，纸面粗糙、纸灰很重，无法印刷照片，画报纷纷停刊，报纸图片工作也陷入停顿。摄影记者拍摄的照片报纸无法刊发，使不少人失去工作兴趣，另谋他职，摄影记者队伍的规模严重萎缩^①。甚至，中央政治学校新闻学系的摄影课，因缺乏器材，学生无法实践，“成为纸上谈兵”^②。可能正是因为摄影记者队伍萎缩和报纸新闻摄影工作停顿，1943年国民政府在认定新闻记者的法定专业资格时，将摄影记者摒弃在外。当时公布的《新闻记者法》规定“本法所称新闻记者谓在日报社或通讯社担任发行人、撰述、采访或主办发行即广告之人。”^③这使摄影记者凭借国家立法建立职业特权并进而对竞争者和局外人形成职业封闭的重要机会失之交臂^④。

抗战结束后，摄影记者队伍方有所扩展，新闻摄影事业亦获得长足进步。《申报》招聘顾廷鹏、俞创硕、陆顺兴等三人为摄影记者，重新建立摄影部^⑤。《大公报》在1947年底聘请魏守忠筹建摄影部门，聘有宣胡权、冯文冈、王文西等专职摄影记者四人。民国专业声誉最高、社会影响最大的《大公报》成立摄影部，也象征着摄影记者最终攀上新闻专业阶梯的顶端。至1947年，全上海的摄影记者人数达70多人^⑥。同时，由于小型相机的普及，越来越多的文字记者、通讯员在采写新闻时能够兼任摄影工作^⑦。一些大报开始与中国新闻社、中央通讯社摄影部等新闻图片社形

① 方汉奇主编《中国新闻事业通史》第2卷，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500页。

② 葛思恩《记早期的政治大学新闻系》，《新闻研究资料》1989年第1期。

③ 《新闻记者法》（1943年2月15日），《社会部公报》1943年第9期。

④ Harold L. Wilensky, "The Professionalization of Everyone?"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vol. 70, no. 2, 1964, pp. 137 - 158.

⑤ 由于缺乏相关档案材料，本文主要是从1946年两个构造周抽样样本中《申报》新闻摄影报道注明为“本报摄影记者”中来统计其摄影记者。

⑥ 《摄影记者联谊会内幕》，《真报》1947年3月15日。

⑦ 在本研究所抽取的《申报》样本中，拍摄照片的记者有：王瘦梅、宋绍柏、杨育（驻台记者）、周祥光（驻印度记者），通讯员（特派员）有：褚裕生、韩清涛、傅俊义。

成稳定而紧密的合作关系^①，并且借助照片传真设备与美联社、法新社、《纽约时报》等建立起新闻摄影交换业务，从海外发来的时事照片隔日即可见报^②。本研究对1946年《申报》两个构造周随机抽样调查发现，共刊登照片120幅，平均每天9幅左右，而且几乎每个新闻版面都有新闻照片。这相对于其当时每日6到12个版面而言，《申报》新闻照片的刊载数量和比例均达到历史最高峰。更重要的是，新闻摄影不仅成为日报日常报道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新闻摄影作为独立报道体裁，以及新闻摄影深度报道体裁开始普遍应用开来，新闻摄影最终进入新闻报道的核心领域。当时，除新闻业和摄影业的中心上海以外，南京、杭州、汉口、天津、福州等地报刊也纷纷开设图画副刊^③。

1947年2月1日，“上海各报社及中央电影新闻厂摄影记者数十人‘鉴于新闻摄影工作艰巨，有互相联络必要’”^④，宣告成立上海市新闻摄影记者协会。不久，在中央通讯社总编辑陈博生、《和平日报》社长黄少谷等报界精英的积极争取下^⑤，1947年10月28日由社会部和内政部联合公布的新的新闻记者界定标准，终于明确规定将摄影记者“应视为新闻记者”^⑥。这标志着国家政权从法律制度层面认可和保障摄影记者是一个组织起来开展公共服务的专业性职业群体^⑦。

但即使在中国近代新闻摄影短暂的黄金时刻，摄影记者依然感到不能充分发挥其专长，他们最大的抱怨是，每天拍摄了大量的新闻照片，但“刊用的仍很少，经常制好了铜版时被文稿挤下来”^⑧。随着战事再起，时局动荡，经济崩溃，物价飞涨，不仅报纸减缩版面，发行下跌，而且主要依靠进口的摄影器材严重匮乏，摄影记者队伍再度萎缩。据1948年上海市新闻记者公会会员名册的统计，摄影记者仅有13人，当时多数报纸，包括《新民报》、《力报》等知名报纸均无摄影记者。即使专事新闻摄影的中国新闻摄影社也仅有摄影记者三人而已^⑨。

① 《申报馆与中国新闻社来往文书》，上海档案馆，馆藏编号 Q430-1-99-1、Q430-1-144-13 《申报馆与中央通讯社摄影部来往文书》，上海档案馆，馆藏编号 Q430-1-98-41 《申报馆与世界新闻摄影社来往文书》，上海档案馆，馆藏编号 Q430-1-99-20 《申报馆与东北新闻摄影社来往文书》，上海档案馆，馆藏编号 Q430-1-99-13 《申报馆与国光通讯社、东北新闻摄影社等来往文书》，上海档案馆，馆藏编号 Q430-1-146。

② 《申报》1946年12月18日。

③ 方汉奇主编《中国新闻事业通史》第2卷，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734页。

④ 《摄影记者协会今成立》，《立报》1947年1月31日 《摄影记者会成立 理监事宣誓就职》，《申报》1947年2月2日。

⑤ 王洪钧《谁是新闻记者》，《中央日报》1947年8月9日 《记者资格》，《中央日报》1947年9月1日。

⑥ 《确定新闻记者身份》，《南京市政府公报》1947年第3卷第10期。

⑦ (美)新闻自由委员会《一个自由而负责的新闻界》，展江、王征、王海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48页。

⑧ 魏守忠、管绍熙《上海大公报的摄影工作》，周雨主编《大公报人忆旧》，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91年，第233-234页。

⑨ 《上海市新闻记者公会会员名册》，上海档案馆，馆藏编号 Q430-1-147。

五、专业知识和职业自主：新闻摄影成为一种专业的理论反思

新闻摄影能够成为一门专业，既非商业摄影自然而然地扩张到新闻领域的必然结果，也不是新闻业采纳摄影技术这样一厢情愿的简单事实，而是摄影界和新闻界的精英人士职业结合（career coupling）的产物^①。摄影界的精英人士将发展新闻摄影视为提升摄影社会地位和文化影响最有力的杠杆，而新闻界的精英份子则试图将以照相馆为主导的时事照片生产纳入新闻生产体系，并进一步控制和提升新闻摄影的品质，两者原本都为优化彼此在各自领域内的利益与位置，其合力却建立起一个全新的新闻摄影职业共同体。

专业知识是专业主义的一种“核心的生成性（generating）特质”^②，而其在民国摄影记者职业化历程中尤为重要，因为它不仅发挥着生成性作用，而且还承担着社会化功能。民国时期始终未能建立培养摄影记者的专门学校或高等教育体制，摄影记者专业协会成立晚、影响弱，摄影记者都是从商业学徒、艺术教育和自学摄影中完成摄影技术的基本训练而转向新闻摄影领域，正是从1920年代中期到1930年代中期围绕新闻摄影理论、道德和价值的集中讨论和广泛交流，不仅将新闻摄影与其他摄影工作以及一般新闻工作区别开来，而且使代际、教育、经历、观念各不相同的摄影记者逐渐形成了其共有的知识范式、职业道德和身份认同。即时人所谓“记者未必能摄影，能摄影未必即为‘摄影记者’”，“摄影记者系专门人才”^③。从这个意义上说，摄影记者群体真可谓是个“知识共同体”（epistemic community）。新闻摄影专业知识不仅建立起摄影记者的职业特性，形成其职业壁垒和社会封闭^④，并且正是通过专业知识的社会化完成职业群体的生产与再生产。

职业自主性，即一种能够对工作实施合法性控制的地位，是现代职业建立起专业地位的最高目标和根本保障^⑤。摄影记者继承了新闻专业主义的理想和话语，宣称在拍摄照片时，客观纪录，传播真相，服务公众，兼之他们崇尚个性化、艺术化地组织构图和经营光影，创作“他人所无而又有新闻价值者方为贵”的新闻照片^⑥，这使新闻摄影超越了单纯再现现实的功能，具有其独特的艺术魅力和审美价值，“构成自存一格的风范”^⑦。新闻摄影既具有新闻的属性，又超越新闻兼备摄影、艺术的

① 有关职业结合这个理论参见（波兰）伊莎贝拉·瓦格纳《音乐神童加工厂》，黄炎宁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11页。

② （英）马立克·科尔钦斯基等《工作社会学》，姚伟、马永清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204页。

③ 记者《摄影记者之常识（一）》，《中国摄影学会画报》1930年5月10日。

④ Silvio Waisbord, *Reinventing Professionalism: Journalism and News in Global Perspective*, Cambridge & Malden: Polity Press, 2013, p. 130.

⑤ Eliot Freidson, *Professionalism: The Third Logic*,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1, p. 12.

⑥ 记者《摄影记者之常识（二）》，《中国摄影学会画报》1930年5月17日。

⑦ 毛松友《新闻摄影概论》，《黑白影集》1936年第3期。

特点，使得摄影记者在新闻组织之内面对其他记者编辑也获得了相当的工作独立性与专业自主性。面对社会，摄影记者依托新闻组织的生产机制和社会影响，在一定程度上摆脱了来自政治、市场和读者的外来压力和干预，拥有“新闻记者人格的独立和职务上的自由”^①，能够最大程度地自觉遵照职业道德，自行运用专业知识，自主产制新闻摄影作品。新闻摄影专业知识体系使摄影记者在报馆内部拥有一定的专业自主性，而摄影记者又凭借报馆这种新闻生产组织和机制对外获得广泛的社会职业自主性。

摄影界和新闻界精英人士通过职业结合创造出职业新闻摄影记者，而摄影记者又凭借其专业知识体系和职业自主性完成从职业到专业的转变，并且最终在现代专业万神殿之中赢得来之不易的一席之地。

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中国近代新闻记者的职业生涯研究（1911-1937）——基于工作社会学的视角”（项目编号：16YJC860012）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华东师范大学传播学院副教授

^① 施伯钧 《新闻记者职业的保障》，《报学季刊》1935年第4期。

justice efficiency and other factors. However, the number of online illegal information dissemination does not have relevance of criminal law interest. The number of propagation times supported by algorithm can easily reach the standard of conviction. The current criminal justice system has not completely ruled out the false transmission times of illegal information. Under these circumstances, using the number of illegal information dissemination as a crime standard violates basic human rights protection and the principle of modesty of criminal law. In order to resolve the risk of expanding criminal governance, the results and behaviors of communication frequency association need to conform to the principles of homogeneity and equivalence respectively. Therefore, the actual infringement of the legal interests of criminal law should be regarded as the necessary condition for criminalizing the number of times of illegal information dissemination on the internet. Additionally, the judiciary must also focus on ruling out abnormal, unreasonable and distorted transmissions, so as to rationally treat the phenomenon of network illegal information dissemination.

95 • A Reflection on the Formation of “Predatory Journals” in the Academic Community

•Liu Zhongbo , Guo Yuli , Liu Hui

Predatory journals have become a common issue facing the global academic community. Previous studies have mostly used the concept of pseudoscience to analyze such journals. These, however, focus on the production of knowledge, while predatory journals involve the dissemination of knowledge, which is significantly different at the level of analysis. Starting from Merton’s sociology of science, this article regards academic journals as an institutional construction, including the establishment of editorial boards, peer review and the date of manuscript registration. In addition to commoditize such institutions, predatory journals also use low publishing fees to entice scholars who have insufficient resources to contribute their papers. This has broken the scientific community’s consensus on academic journals, and has also made it more difficult for scholars to integrate with each other based on scientific norms between those who are affiliated to leading universities and those to common universities.

110 • The Rise of Professional Photojournalists in Modern China

•Lu Pengcheng

Under the perspective of social theory and history at work,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rise of professional photojournalists in modern China. Photojournalism was the outcome of career coupling between elites in press and photography. In this social process, photojournalism gradually obtained its unique knowledge system. Professional jurisdictional claims of photojournalism had been gradually forming and consolidating. Photojournalism thus stood out from commercial photography and became a profession.

英文编辑 段铁铮